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4

陶渊明

俞樟华 陈兴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杨群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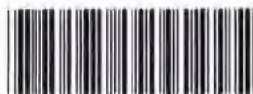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 T232248 *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陶渊明

俞樟华 陈兴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渊明/俞樟华等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1969-1

I. 陶… II. 俞… III. ①古体诗—文学评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②陶渊明(365~427)—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731 号

陶 渊 明

俞樟华 陈兴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6 千字 印张: 3¹/₄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维良

王 颖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杜风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969-1/I·1707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俞樟华 1956年3月生，浙江临安人。1982年1月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著有《史记新探》及《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史略》、《司马迁一家言》（合作）等论著，校点出版《四史评议》、《历代名臣传》等典籍多种。



陈兴伟 1954年1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浙江师院中文系，同年留校任教。1996年11月调离中文系，主持浙江师大图书馆工作，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间涉古代文学。先后在《文学遗产》、《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文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目 录

- 一、仕而隐的经历/1
- 二、质而实的诗作/24
- 三、淡而腴的诗风/46
- 四、少而精的文赋/66
- 五、深而广的影响/91

一、仕而隐的经历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江州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历经晋、楚、宋三朝十个皇帝，享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际，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混乱的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此起彼伏，异常尖锐复杂。陶渊明十九岁那年，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在谢安的组织指挥下，以弱胜强，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前秦苻坚百万大军的南侵，暂时稳定了局势，露出了一线中兴的生机。但是，汉、胡的民族矛盾刚得到一点缓和，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急剧起来了。谢安功高震主，招致了皇室对他的猜疑，君臣之间有了隔膜，无法同心协力开创新的局面。谢安死后，专横跋扈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把持了朝政，他们恃宠骄恣，窃弄权柄，结党营私，势倾内外，极大地加深了帝室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他们或互相排斥，互相倾轧，或拥兵自重，刀兵相向，



陶渊明画像

由一般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发展到了军事战争。晋安帝隆安元年(397),镇北将军王恭以诛讨司马道子的心腹王国宝为借口,在京口举兵,得到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的积极响应。

司马道子无可奈何，只好杀王国宝以谢王恭。接着，王恭在进逼建康途中，又被部将刘牢之所杀。于是桓玄被推为盟主，继续与朝廷对抗。公元399年，桓玄火并殷仲堪、杨佺期，势力勃涨，朝廷被迫以桓玄为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州、江州刺史。公元402年，桓玄举兵东下，毫不费力地攻入建康，杀了司马元显。次年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楚。与此同时，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公元399年，终于因司马元显的倒行逆施而爆发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起义队伍便发展到了数十万，斗争的烈火燃及今天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等许多地方，而且前后坚持了十二年之久。来势凶猛，为时又长的农民起义，使本来就动荡不定的东晋政局更加分崩离析，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桓玄改朝换代后，不仅农民起义的反抗斗争仍在继续，其内部也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北府兵将领刘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起兵反抗桓玄的。刘裕消灭了桓玄势力后，逐渐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实权。到公元418年，他派人缢杀了“自少及长，口不能言”的白痴皇帝晋安帝，由他的同母弟司马德文继位，是为恭帝。公元420年，他终于代晋称帝，建立了刘宋王朝。第二年，又命人将禅位降为零陵王的晋恭帝掩杀掉。这一年，陶渊明已五十七岁。诗人一生的所见所闻，都是这些血淋淋的东西，它对诗人身心的伤害，是十分惨重的。而这连年不

息的战火,对诗人的家乡江州浔阳的破坏也非常之大。江州地处荆、扬二州之间,作为军事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先被桓玄盘踞过,接着又被刘裕占领。后来又被桓玄的故将刘统、冯稚等攻陷,然后刘毅又派刘怀肃予以讨平。此外,农民起义军也先后数次到过江州。于是江州就成了多灾多难的地方了。这一件件流血斗争,这一幕幕民不聊生的情景,对陶渊明进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他生活道路的抉择和诗文创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说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既概括出了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特点,也揭示了陶渊明思想和创作的时代背景。他的仕而隐、隐而仕,与这乱世有关;他把官场比作“樊笼”、“密网”,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也与这乱世有关;他在创作中不断否定现实,拼命追求理想,还是和这乱世有关。陶渊明的思想,在乱世中获得了升华;陶渊明的人格,在乱世中得到了磨练;陶渊明的创作,在乱世中达到了高峰。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国家不幸诗人幸。”

陶渊明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立了大功,被封为长沙郡公。但是因为出身寒微,仍被那些讲门第、重郡望的贵族官僚讥为“溪狗”、“小人”,受到歧视。陶侃于吏事勤勤恳恳,十分努力,在任广州刺史时,空闲时就将一百

块沉甸甸的砖头，早上从屋里搬出去，晚上又如数搬回来，害怕过分悠闲而不堪胜任“致力中原”的大事。他还常用“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的话来鼓励部下珍惜时间，努力上进，以求青史留名。他这种积极进取，力图有所作为的思想，对陶渊明少壮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思想的产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陶渊明在《命子》诗中向儿子陶俨列数陶门光荣家史时，就对这位有功又有德的“桓桓长沙”曾祖父陶侃表达了无限自豪和仰慕的心情。陶侃还非常关心民瘼，注重农事，《晋书》本传载，陶侃“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重农是陶家的优良传统，以后陶渊明亲自参加了农耕劳动，非常关心桑麻的长短，收成的好坏，并在《桃花源记》中提出了人人劳动，家家自给的理想主张，正是其曾祖父重农劝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陶侃在镇守武昌时，曾命部下种了不少柳树。陶渊明也在自己家门口种了五棵柳树，并用“五柳”作为自己的别号，有人认为这和纪念陶侃有关，因“五”与“武”谐音，五柳即有武昌柳之意。这个猜测并非毫无道理，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陶渊明对这位功勋盖世的曾祖父的崇拜心理。

陶渊明的祖父茂，做过武昌太守，《命子》诗里说他“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不仅为人正直，而且为官也有政绩，可惜至今已没有什么记载了。陶渊明的父亲逸，做过安城太守，《命子》诗有“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四句描写，说他父亲生性恬淡，为官不喜，去职不怒，这倒与陶渊明自己的性格有些相似。可惜他才八岁就死了父亲，家道也因此中衰，留给他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困苦。陶渊明的母亲孟氏，是孟嘉的女儿，而孟嘉又是陶侃的女婿。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陶渊明对这位庄重儒雅，名冠乡里的外祖父很是仰慕，在所作的《孟府君传》中，他这样称赞其为人：“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外祖父温雅平和，飘逸潇洒的风度和任情嗜酒，崇尚自然的志趣，也正是陶渊明自己的追求与爱好。陶渊明还有个叫陶夔的叔父，曾做过太常、参军等职。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任彭泽县令，就是由这位叔父推荐的。陶渊明没有同胞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小他三岁，后适程氏，死于武昌，陶渊明写了《祭程氏妹文》，表示哀悼。陶渊明还有仲德、敬远两个叔伯兄弟，互相感情颇深，这从他写的《悲从弟仲德》诗

和《祭从弟敬远文》中可以见出。陶渊明的前妻早丧，续娶翟氏，或说是庐山隐士翟汤的后代，她与陶渊明“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南史·隐逸传》），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是典型的贤妻良母。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分别叫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小名分别叫陶舒、陶宣、陶雍、陶端、陶通。因为都“总不好纸笔”（《责子》），所以平平常常，不见有什么成就。

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从小就潜心读书，孜孜向学，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良好教育，有着“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和“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虽然他也“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有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的志趣，但是作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和元勋之后的他，一直是积极入世，希望鲲鹏展翅，有所作为的。他几番出仕，又几番归隐，说明他一直在努力，在拼搏，在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真是淡泊消极到什么官也不想做了，那就用不到这样苦苦挣扎，这样辛勤奋斗，晚年也不会发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的深长感叹了。实在是那个时代太黑暗、太残酷了，不用说他的雄心壮志无法实现，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了保证，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那“爱丘山”的素愿上升为主导思想，并有力地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终于走上了辞官归田的生活道路。

东晋是门阀制度发展的鼎盛期，仕途全部为士族地主所垄断，选拔人才，职位升迁，全以门第尊卑为标准。所谓“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赵翼《廿二史札记·九品中正》），正是对这种现状的准确概括。陶渊明因家道中落，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充裕的生活条件，为以后的进身及生活都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大概是一直缺乏合适的机会，陶渊明第一次出仕已经二十九岁。史载他因“亲老家贫”，到江州做了祭酒。当时的江州刺史是王凝之，这是一个极端迷信五斗米道的地方官，也许他让和尚道士在官府攘佛咒鬼闹得乌烟瘴气，又让陶渊明干着琐碎不堪的杂事，这就使满怀济世之志步入仕途的陶渊明感到了事与愿违，他既看不惯官场的污浊，又经不起行役的繁忙与劳累，觉得还不如返回田园好，所以没过多久，他就主动解职回家了。第一次出仕的失败，使陶渊明对现实的认识加深了不少，对出仕的选择也更为谨慎。因此，对随接而来的州里召他回去做主簿的事，他也没有轻易答应。

陶渊明辞去江州祭酒的官职，只是“不堪吏职”，并没有对仕途完全绝望。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桓玄举兵勤王，成了反抗司马道子专政的盟主，人们因为早已对司马道子父子的暴虐深恶痛绝，所以把拯救国家，除掉腐败不堪的司马道子的希望寄托在桓玄身上，一时纷纷归附。陶渊明大概也觉得这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良机，于是静极

思动，毅然投到桓玄幕中做了一名参军。而这一做，就做了近三年。这是陶渊明一生仕宦生涯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次，可惜他的诗文对这一段经历没有作正面的具体的描述，我们至今对他在桓玄幕中到底干了些什么事不甚了了。但是从他此时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至少透露了这样的信息：1. 庚子岁(400)和辛丑岁(401)这两年，陶渊明不仅确实在桓府供职，而且还奉桓玄之命到京都办过公事，并请假回家省亲；2. 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等诗句中，表达了诗人厌倦官宦生活，向往田园生活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在当时风云际会，正可现英雄本色的时候产生了想辞官归隐的念头呢？因为桓玄是个野心家，陶渊明虽然不能未卜先知，预料到他日后会篡位称帝，但他身处其中，对桓玄的阴谋和野心必然有所察觉，因此便大失所望，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归田的思想。公元402年，正好遇到母亲去世，陶渊明就理所当然地丁忧回家了。也因为他抽身早，所以才没有卷进桓玄篡晋的政治漩涡之中，避免了更大的伤害。

在居丧期间，陶渊明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并没有消退干净，他为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序》）而焦虑不安，于是写下了“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

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这样充满激情，充满希望的感人诗句。公元404年，陶渊明在守孝三年未滿的情况下，又迫不及待地投到当时反对桓玄篡位声势最大的军阀刘裕军中做了参军。东晋王朝尽管黑暗腐朽，可是桓玄取而代之，仍然不得人心。刘裕以反对桓玄篡位，恢复晋王朝的名义起兵，成了正义之举，自然受到人们的拥护。陶渊明受此影响，也认为国家中兴有望，自己功业可成，所以抱着一线希望，再度踏入仕途。可是刘裕一旦大权在握后，就大肆残杀功臣，排除异己，桓玄旧党一时被清洗殆尽，其用心之卑鄙，手段之恶劣，比桓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陶渊明又一次跌入失望之中。他不愿同流合污，又担心大祸临头，不久便辞掉了刘裕的官职，转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了参军。公元405年3月，刘敬宣改授宣城内史，陶渊明也辞职回到了故乡。闲居到八月间，壮心不已的诗人再度鼓起宦海搏击的勇气，去做了彭泽县令。但是，官场的丑恶腐败，使他的美好愿望再次成为泡影，也使他对仕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官仅八十余日，他便拂袖而去了。关于这一次出仕的经过，萧统《陶渊明传》作了如下记载：“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

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就这样，他的仕途生涯从此打上了句号。

陶渊明从晋安帝隆安二年开始入桓玄幕，到晋安帝义熙元年冬辞彭泽令，前后正好八年，这正是晋末政局最动荡、变化最大的时期。袁行霈先生分析说：“陶渊明出仕做官，不到别处，恰恰入了荆州军府桓玄幕中，又入了北府将领刘裕幕中，接着又入了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幕中”，“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虽然他一再说因为亲老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这八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要出仕也不一定非往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跳不可，荆州和北府是什么地方，他不会不知道。”“总之，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为，才毅然归隐。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他的归隐，也是不

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二期）这个论述是精辟的，陶渊明之所以仕，又之所以隐的原因，确实首先应该从政治方面考虑。

这里，我们还需要对陶渊明的出仕原因作点补充分析。《宋书·陶渊明传》说他之所以出仕是因为“亲老家贫”；颜延之《陶征士诔》也说是“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陶渊明自己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第十九首），又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归去来兮辞》），于是后人遂众口一辞，说陶渊明是为了养家糊口才被迫出仕的。其实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第一，如果真是“亲老家贫”，无以为生，那么诗人就不该等到而立之年才姗姗出仕。第二，既然为生计出仕，按常理就该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职位，他首次担任的江州祭酒，据《宋书·百官志》，是“居群僚之上”的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倘能苟且，其俸禄足以养家，可是诗人并没有太在意，仅“不堪吏职”就毫不犹豫地主动抛弃了。而为官却“不堪吏职”，不是也太任性狂为了点么？第三，他回家后，一呆就是多年，并没有为